



光荣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

难忘的岁月

目 次

难忘的岁月	吳先恩 (1)
立夏节的晚上	南京部队征稿組 (19)
扑不灭的火	闕启普 (30)

难忘的岁月

吴先恩
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有许多难忘的事，一九二七、一九二八这两年，是我最难忘的岁月……

三堂“红学”闹革命

我的家，是黄安县箭厂河区四角曹門。在我們的村前是一条长年不干的倒水河，順水而上，就是全国聞名的大別山脉。肥沃的土地，靜靜的河流，巍峨的高山，都是我們家乡人的驕傲，可是，在那个年代，这一切，都屬於官家和地主的。每到秋收季节，农民眼望着滿地的稻谷，就心酸地唱着：

.....
辛苦一块田，
死活奔一年，
粒粒米粮血汗换，
——农友呀！
地主来吞占。
.....

我們家祖輩的生活，都象这支歌唱的那樣，老少死活忙了一年，冬天連紅薯都吃不飽。這年——一九二六年的夏天，一天我站在地頭上，望着沉甸甸的稻穗，正愁着交不起租子，身後有人向我打招呼：“今年谷子好嗎？”

這人是從麻城上中學回家的吳煥先。不知為什麼，今年放暑假回家，總愛找窮哥們談話。我說：

“谷子長得不錯，一交租就剩不多了！”

“你家要交多少租？”

“二十五石啊！”

“不交不行嗎？”他說着，坐在我身旁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現在全國各地方都在鬧革命，快參加鬧革命吧，分了地主的土地就不用交租了。誰種的田歸誰，……”他滔滔地說着：什麼北閩軍打來了，共產黨要領導窮人革命。軍閥、地主多可恨……這些話，我不能完全懂，可是聽起來，心里滿痛快。

晚上，人們在倒水河岸上乘涼，又紛紛談論開了。這個說，煥先這次回家，全變了，說話總靠着窮人；那個說，煥先每天跟他的同學開會，說要辦“紅學”；不知是誰悄悄地說：

“煥先入了共產黨啦，共產黨，就是分財主的东西，種地不要租。”

“要是真的，那就好了！”

“怎麼不真呢！七里坪，紫雲區都鬧起來了！”

我一面听，一面想：真象說的这样，那就好了。我跟地主当过长工，抬过轎子，挑过脚，不知受了多少气。有一次，跟地主干活，因为多吃了一碗飯，挨了地主老婆一顿罵。还有一次，在地主魚塘边捞了一条死魚，还受了两块錢的罰款。要是真的能把地主“革”倒，穷人再不受气了！可是，革命怎么“革”法呢？……

过了几天，风声更大了。煥先家里人人来人往，說村里要成立农民协会。一天晚上，农民协会当真成立了，还选我当了委員。农民协会的主席是房长吳惠容。开过会之后，煥先找到我們說：不能选吳惠容当主席，要选老实人。过了几天，把吳惠容罢了，又重选裁縫耿紀荣当了主席。

接着，吳煥先、吳先筹、吳先保办了“三堂紅学”，好多青年人都入了“紅学”（即訓練革命武装的紅枪会）。我也参加了煥先办的那堂“紅学”，周围七八个村都轟轟烈烈鬧起来。

箭厂河是“鷄叫听两省，狗咬三县惊”^①的地方，这样一鬧，惊动了光山县桥南八保首戶的大地主陈二輝，他手下有三十堂紅枪会，說要和我們开仗。消息传来，煥先向我們說：

“咱們的‘紅学’是老軍賜法，陈二輝紅枪会的法师是王八变的，不怕它！”

① 这是两省三县交界的地方。两省指湖北、河南；三县指黃安、麻城、光山。

“打脚魚叉捉它王八蛋！”

不知这是誰的主张，第二天就四处去請铁匠，农民协会的人，有錢的出錢，有碎铁的捐碎铁，在煥先門口架起了二十盘铁匠爐，叮叮当当打开了脚魚叉。

起初，我們还喝符念咒，慢慢懂了些革命道理，便不迷信了。一天到晚，赤背光膀子練脚魚叉。練累了学革命道理，学习唱“打倒列强”的歌。

鬧騰了一个冬天，旧历年到了。一天晚上，煥先問我們：

“你們想不想过个丰年？”

“怎么不想啊！”大家齐声說。

“向地主借粮过年好不好？”煥先又問。

往年这个时候，地主要催租逼款，今年要反过来去借，大家虽然高兴，只是怕借不来。有的說：“他們不借給怎么办？”

煥先拿过一把脚魚叉，用劲地晃了晃說：“那家不借給，就讓他看看这个！”之后他就帶領大家，拿着籬筐、布袋往地主家里涌。几家地主早吓得不敢露面了，見此情景，沒有敢說不字的，紛紛打开粮仓，“借”粮給我們。……

旧年一过就是元宵节了。煥先組織了一伙青年人化装出去宣传，有的扮个地主，有的扮个大鼻子“洋人”，有的扮个軍閥，打着洋鼓，吹起洋号，到处去轉。人們不看龙灯花船，拥挤着看我們的新玩艺。煥先和其他的人就

演講，指着“洋人”問大家：“帝國主義侵略我們中國，大家說行不行？”人們就喊：“不行！”他又指指“地主”問：“他剝削窮人合理不合理？”“不合理！”煥先領頭高呼着：“打倒帝國主義！打倒豪紳地主！農民們組織起來！……”

人們憤怒了，覺悟起來了，革命的火焰，在各村燃燒着。農民協會紛紛出動，扒地主的糧倉，搜地主的財寶，連三山門官卡上的八條槍也繳了。……

“四一二”之後，陳二輝借助反革命的凶氣，派紅槍會和一股土匪向我們箭廠河區打來。我們幾千人堅守在木城寨（這是太平天國的古戰場），跟反動的紅槍會拼起了刀槍。打了七天七夜，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，黃安縣委從武漢搬來了救兵，陳二輝的紅槍會，如同王八滾西瓜似的，沒命的逃跑，我們端着腳魚叉，呼叫着猛追下去。……

黃安失敗

一九二七年舊曆十月二十一日，我們配合全县起義的農民，攻占了黃安縣城。農民政府成立了，工农革命軍誕生了，四鄉的農民，歡天喜地，如同過年一般，到處開會慶祝勝利，到處鞭炮齊鳴。人們歡呼着：“新政府萬歲！”

反動的地主豪紳，更加驚慌起來。他們收買一股土匪，多次圍攻到黃安城下。我們堅守城樓，架起太平天國留下的土炮，用罐子裝上石灰，設上滾木、擲石，跟反革命

搏斗。四乡的农民，象赶集似的，也都涌进城来，高呼着：“保卫新政府！”“保卫黄安城！”的口号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反革命的十二军奔袭了黄安城。他们象潮水似的涌了进来。我们用石灰罐子、脚鱼叉、鬼头刀跟敌人厮杀着。他们打进来，我们打出去，混战在城门口。突然，我觉得有个东西猛地打来，两眼一黑，昏倒了。我们小队的吴先汉，跑过来急忙把我扶起，说：“你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我摸了左膀，一把血沾满了手，这才知道负了伤。向他说：“你别管我，快去……”他没容分说，背起我就走。这时只听见潘忠汝总指挥在城门口高声叫着：“同志们，打啊！保卫我们的新政权！……”激烈的枪声，越响越紧，我昏迷着失去了知觉。

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看看已经出了城。天已经快黑了。我问吴先汉：“咱们的人呢？”他说：“都不见了！”回头望望黄安城，燃起了熊熊的烈火。城，已被敌人占了。

从城里退出的人，断断续续往北跑，几个同志抬着我，跟着追了上去。

半夜，我们来到黄安北二十里的古峰岭。副总指挥吴光浩同志，正集合队伍。但是，拿枪的人不多了，都是扛脚鱼叉拿大刀的农民。先汉流着泪向我们说：“潘总指挥牺牲了！”我们听了都很难过。

几千农民围着吴光浩同志，齐声呼叫着：

“我们要打回去！替潘司令报仇！”

“把潘司令的尸体找回来!”

“我們人多，不怕鋼槍!”

憤怒的呼聲，衝擊着黑夜的長空。吳光浩同志對老鄉們解釋說，革命是長期的，我們不能為了一個城和反動派拚死，將來总有一天，我們會再次把黃安打下。他勸農民兄弟們先暫時回去，有機會再說。大家在他的勸說下，才三三兩兩散去。……

天亮了。我們自衛隊的黨代表吳煥先同志見我的傷很重，決定要我們幾個傷員先找個地方隱藏養傷。

“你要去哪兒?”我問他。

“還不一定。”他堅定地握了握拳頭，轉臉望着黃安說：“死不了，就要干革命！总有一天，我們還會打回去的。”

我住在天台山一個劉老漢家里，用一些草藥醫治着傷口。反革命的部隊占了黃安，到處燒殺，聽說吳光浩同志帶着十幾個人，上了木蘭山；吳煥先同志不知去到什麼地方，接連兩個多月，沒有音信。我的傷口漸漸好了，又聯絡了幾個跑散的和負傷留下的同志，但是大家都十分困難，沒有吃的，沒有穿的。正在沒辦法的時候，一天晚上，煥先派來一個“交通”，帶來了五十塊錢，捎口信說要我這些錢分給同志們用，不久他就回來。

我望着“交通”交給我的五十塊錢，想起煥先臨走說的話：“死不了，就要干革命！”如今他流落在哪兒，這錢又

是怎么来的呢？后来见了面，谈起来，才知道他赤手空拳打了一家土豪。

原来，自从我们分手以后，他化装了一个阴阳先生，穿着长袍，带着罗盘，为革命四处奔走。一天，走到罗山叶家湾附近一个山上，饿的再也走不动了，便跟几个放牛的孩子谈起来。他指指山下一座新盖的瓦房，问孩子们：

“那家是个老财吧？”

“老财是老财，”一个孩子得意地说，“就是今年不发财。小兒媳妇刚死，耕地的黄牛又死了。”

孩子们围着他，纷纷讲着，说这家老财多么阔，又多么黑心：年年买地盖新屋，连一块锅烙巴也不肯给讨饭的人。他还喂着只大黄狗，不知咬伤多少人。……

焕先忽然灵机一动，决定下山去打这个土豪。他大模大样走到了地主门口，念着他自己编的几句诗：

新开的高楼逆水流，

栽秧的时候死耕牛，

小兒媳妇难产死，

看家的黄狗肿了头。

地主家里走出一个人，连忙问他：“你先生是哪里来的，怎么知道这些事？”焕先冷冷一笑，打开罗盘，指了指新盖的门楼说：“太西当头坐，无灾必有祸，我乃张天师道下的门生，这样的灾，怎能瞒过我的眼！”

这时老地主正愁着发财无门，听说门外来了个“高

明”的阴阳先生，急忙跑出，将煥先請到客厅里，請了酒飯，再三要求为他家破灾看风水，煥先見这家是个“土”財主，就故意地摆出“張天师”道下門生的架子，講了一陣。最后說：“你家灾难太大，我要回去請老师来。”地主一心想破灾发大財，便送給了他五十块錢的压礼……

去江西的路上

一九二八年五月，我的伤完全好了。这时，潜伏在各地的同志們，又聚集起来。煥先向我說：江西德安县和湖北的阳新地区，有一个蔡申熙同志，他是广州起义失敗后到那里的，現在正組織紅軍，要我和吳先定去取联系。

一天，我和吳先定化装成跑小生意的，挑了两担草藥，就下了武汉。打算从武汉乘船去江西。

我們从出发地到武汉不过三天的路程，因反动派查的紧，只好繞路走。在路上走了五天，一天晚上才到了汉口，在六碼頭林兴发山貨行落了脚。这时，反革命的气焰正盛，每天都在大屠杀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們正要上街，忽然听見街上人語哄哄，接着响起了一陣激昂的口号：

“打倒叛变革命的蔣介石！”

“工人农民联合起来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我們急忙跑出去，只見一長串雙手被縛的男女青年，一面昂著頭向城外走，一面高呼。我和先定都低下了頭，默默地走回房間。這時我想到黃安失敗後，無數的同志慘遭屠殺，也想到我的家：七口人，除了母親逃亡在外，其他的人，都被反革命殺盡了！仇恨！血的仇恨！反革命蔣介石，你欠下我們多少債啊！

茶房走了進來，望了望我們，說：“你們可聽見啦！慘啊！這裡每天都殺人。世界上，真有不怕死的漢子呀！”

我們都沒說話。茶房出去後，先定把臉埋在被子裡，哭起來。我怕被人聽見，急忙伏在他的耳邊說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他們死了，還有我們！”先定慢慢地抬起臉，含著淚，微微點了點頭。象是回答我：“是的，他們死了，還有我們！……”

第二天，我們在房子里正愁著買不上船票，突然，街上又傳來了一陣騷動。我們從窗口望，只見又是一串雙手被縛的青年男女，個個的舌頭上，都串著鐵絲。但是，鐵絲只能封住他們的嘴，卻封閉不住他們的心，一個個挺著胸，頭一昂一昂，仍象是高呼著：“共產黨萬歲！”……

我們再住不下去了，托茶房買了兩張船票，第三天一早，搭上了去江西的輪船——英國“太古號”。因為我們把兩担草藥賣掉了，上船之後，為了安全，就跑進了鍋爐房。一個燒鍋爐的工人，上下把我們打量了一番，問道：

“你們從哪兒來？”

“黃安。”我們的口音，不允許說謊。

那個工人點了點頭，压低聲音說：“你們那里，鬧革命鬧的很凶吧？”

我說：“不知道。”

那位工人同志，象是看透了我們，笑了笑，沒再問下去，轉口問道：“沒吃飯吧？這里還有飯。”說着拿了些飯，要我們吃。

輪船離開了武漢，在望不到尽头的大江里，破浪前進。當船上的人都靜下來的時候，那位工人同志湊到我們跟前，悄悄地說：“你們那邊鬧的好，好！別耽心，明天下船的時候，我送你們。”說着塞給我一塊錢：“拿着吧，我知道，你們很困難！……”

我望着他那黝黑的臉，結實的兩臂，心里充滿着親切、溫暖的感情。我們沒把心里的話對他講，他也沒對我們說更多的話——只告訴我們，他叫李和，但是，“同志”這兩個字，都在我們心里，彼此親切地叫着。……

在這難忘的歲月里，有許多使我難忘的人。李和同志，也是其中的一個。

紅薯地里埋銀元

半年之後，我們接到煥先同志的信，要我們轉回黃安。並要我們帶一部份子彈。于是我們從江西德安買了

两担草紙，把当中挖空，装了一千发子弹，通过层层封鎖，又轉回了黃安县。这时紅軍有了三个大队，在黃安县境，又掀起了新的斗争。

一九二八年深秋的黑夜。在黃安县紫云区一个村里。

人們已經熟睡了，除了凉风卷着落叶的声响和远处的狗叫声之外，别的什么动静也沒有。

党代表吳煥先同志正召集我們开会，討論在敌人清剿、屠杀的情况下，如何坚持斗争，开辟这一带新区的工作。

會議快要結束了，忽然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，紧接着枪声就連成了串串。不用說，我們又被敌人包围了。因为这种事情對我們來說，已經是習慣了的。

党代表一步跨到窗前，向大家作了个手势：

“靜！”側耳听了听，他立即轉过身子，把手枪一举喊了声：“跟我来！”于是以五支步枪組成的突击队，在他的率領下飞也似地冲向大門，发出一陣排枪，接着又扔出几个手榴彈，封鎖大門的几个敌人便应声倒地，我們后面的梭标队就乘隙冲了出去，但是敌人仍在后面尾追。

虽說白軍凶狠，赤卫队的大刀對他們也是毫不留情的。我們終於冲出了重围。

天快亮了，我們轉移到一座高山上停住了脚。敌人

多次吃过我們“麻雀战”的苦头，因而不敢跟踪上山。可是我們也走不成了；敌人用一个营的兵力，还加上些民团，把整个山头围成了一个圈圈。

过了三天，敌人还是不撤走，他們想把我們三十几个人困死在山上。我們除就地弄点野菜、野果之外，别的什么吃的也沒有。三天了，这怎么受得了呢？

铁匠出身的牛挺刚同志，长得很胖，加之膀大腰粗，健壮得跟牛一样，大家便送了他一个外号叫“牛肉”。他正坐在一块大岩石的背后監視着山下的敌人。

我走到他的身旁，开玩笑地問道：“‘牛肉’！二十斤的铁锤还能不能掄得起呀？”

“不成了，三天沒吃飯了。小队长，您看我的肚皮……”說着，便掀起衣襟，用手拍着他那凹了进去的、松松的大肚皮。

我想再跟他說点什么，忽然他那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胳膊，說：“小队长，我建議馬上打出去，要是再餓上一天，連这口大刀我也掄不起来了！”

“牛肉”的这几句話，也就是我心里的話。我說：“我这就去請示党代表去。”

勤务兵蔡斗子，原是个活蹦乱跳的小鬼，他有唱不完的歌，說不尽的話。可是現在，他搭拉着脑袋在一棵大树底下一动不动地坐着。見我走来，便慢慢地抬起了头，无力地朝我笑了笑。

“怎么样，小鬼？还能坚持多久啊？”我問他。

他用两只困倦的眼睛直盯着我，沒有回話，只是笑了一笑，我懂得了他的意思。

要是現在有一口飯給他吃下去，这小鬼馬上还会唱起来的……。我这样想着想着，不覺来到党代表的跟前。

党代表吳煥先同志紧紧地皺着眉头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他知道，这支赤卫队的存亡，是关系着这个地区的革命工作能不能开展，紅色政权能不能建立的重大問題。往外打这是一定的；但現在还不是时机，敌人戒备森严，要打出去不是容易的。……

我的到来，打斷了他的沉思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還沒等我开口，他就这样果斷地回答了我。接着，又斬釘截鉄地說道：“我們在这里餓肚子，目的是麻痺敌人，造成突围的条件……”

“不吃东西不成啊，連‘牛肉’都頂不住了！”我着急地插了一句。

“等黄昏的时候，敌人还不来攻山的話，我們再組織人去采些野果。暂时只有这么一个办法。”他象是自言自語，又象是对着我說，“派出去偵察的同志今晚該回来了……”說完，他又举目望着远方。

太阳落山了。周围的景物也漸漸地模糊了。

三天来敌人一次也没有向山上攻击。白天，只是打些冷枪，喊些无聊的话：“你们跑不了啦，快投降吧，不投降就把你们饿死……”每到黄昏以后，他们又象死了一样的沉寂。今天也不例外。

遵照吴焕先同志的指示，我又带上一小队人去采集野果。小蔡斗子那股活蹦乱跳的劲头又上来了。他一边走一边信口唱着：

深山密林是我房，
野果、野菜是我粮。
不怕艰难和困苦，
坚决奋斗不投降！
有朝一日得胜利，
全国人民有福享。

歌声突然停止了。

“‘牛肉’，可好了！这有一块红薯地！”食欲使年小的蔡斗子忘掉了纪律，说着，就用他那两只漆黑的小手没命的扒了起来。

“不许动！”“牛肉”坚决地制止了他。但同时我又清清楚楚地看到，“牛肉”转过那门板一样的身子，背着蔡斗子咽了一口唾沫。

“牛肉”的这句话，恢复了小蔡斗子的理智。他朝“牛肉”做了一个鬼脸，又唱了起来。其实，发现这片红薯地最早的就是党代表。那天我们刚到了山上，他去周围看